

# “走”与“化”:人生理想的幻灭和挣扎\*

## ——鲁迅《故乡》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的对比阅读

范卫东<sup>1</sup>, 夏欣才<sup>2</sup>

(1 南京艺术学院 党委办公室, 南京 210013; 2 苏州电视台 新闻中心, 苏州 215006)

**摘要:**从《故乡》与《归去来兮辞并序》几幅画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鲁迅和陶渊明都是各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又同遭理想的幻灭,在幻灭中挣扎。“走”与“化”是他们各自永恒的人生姿态。

**关键词:**鲁迅; 陶渊明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278(2000)06-0039-07

陶渊明一直被许多论家所误读和扭曲。钟嵘在《诗品》中称他是“千古隐逸诗人之宗”,把他仅列为“中品”,为陶渊明定下的这个基调,影响了后世的很多人。鲁迅在他一生的著述和文学活动中,多次提及陶渊明。他认为“《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遗忘和冷淡”,“于朝政还是留心”。<sup>[1](P112)</sup>并对陶渊明的文学地位作了肯定,“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sup>[2]</sup>。

在鲁迅小说中,《故乡》是风格独特的一篇,抒情意味很浓。这篇小说取材于鲁迅1919年12月的故乡之行,“美丽的故乡”梦破灭后,他不曾再回故乡。于鲁迅对故乡绝望、逃离、厌恶、批判,又有抹不去的浓浓乡愁的复杂乡恋,这是带有总结性和象征性的一部告别式作品。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以下简称《归》)正带有这种总结性和象征性。他几仕几归,几隐几出,于公元405年辞去彭泽令,彻底归田而不复出,开始了长达20几年的田园生活。《归》写于辞去彭泽令后,感情真挚,是一篇最后同上层社会告别的宣言书。

《故乡》写于1921年,《归》写于公元405年,作者都恰过不惑之年,历经了40年的坎坷沧桑和艰辛跋涉,他们会对故乡说些什么呢?鲁迅“专为了别他而来”,永远离别故乡,去完成“改变他们的精神”的夙愿;陶渊明“鸟倦飞而知还”,永远固守田园,“颇示己志”。从这个切入点出发,将这两篇作品进行比较,有助于探究两位大家的心灵相通之处。

同具中国传统诗文中还乡母题的《故乡》和《归》,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差异和同构,使还

\* 收稿日期:2000-03-10

作者简介:范卫东(1968-),男,江苏大丰人,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办公室讲师,文学硕士;夏欣才(1973-),男,江苏高淳人,苏州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文学硕士。

乡历程中的几幅画面具有可比性,联系全篇和鲁、陶的为文为人,发现他们存在着表层意义上的“异”和深层意义上的“同”。他们在理想的幻灭中煎熬和挣扎,“反抗绝望”和“乘化以归尽”正是他们这种生命哲学的体现。请看“行旅图”: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故乡》)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

“一切景语皆情语。”《故乡》的“行旅图”色调暗淡,气氛凄凉,这是现实中国破败农村的写照,也是“我”凄然怅惘心境的衬托,更是下文“美丽的故乡”梦破灭的预兆。《归》中的诗人却显出卸官回乡,如释重负的轻快和愉悦,“问”、“恨”两字将诗人急迫的“归欤之情”写得活灵活现。再看“还家图”:

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故乡》)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归》)

《故乡》中的凄凉、陌生和隔膜,在《归》中几乎一一对应着变为欢欣和相亲相爱,故乡接纳归家游子的气氛竟是这样不同!

《故乡》中的两幅画面展示了鲁迅“背对故乡”式的决绝姿态<sup>[3]</sup>。故乡给他的只是怨愤、痛苦和永远的无家可归的漂泊感,却不是他心里最温馨情怀的栖息地,也不是能做人生旅途中失意时的避居港湾。鲁迅少小离家,人生的第一个驿站是南京,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朝花夕拾·琐记》)1905年,他从日本回国,奉母命违心结婚,故乡于他又多了一层难以言说的隐痛。1919年11月给许寿裳的信中又说:“明年,在绍之屋为越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知其何故也。”这正是同年12月还乡的缘由,“专为别他而来”,从此不再回故乡。

但从鲁迅人生历程的情感脉络中,又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深深的思乡之河的流淌。1901年4月,在南京,他在《别诸弟三首》的“跋”中写道:“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1902年赴日留学后,在他给友人的信函中亦时时可见浓郁的思国思乡之情:“仙台久雨,今已放晴,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sup>[4](P135)</sup>1927年5月在广州作的《朝花夕拾·小引》称“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1936年,病重之时,他在给游人的信中还这样写道:“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鲁迅的一生,就在这种现实的离乡与心理的恋乡、冷静的理性与强烈的感情的

交织中煎熬，一直到溘然长逝。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故乡》中，现实的故乡是如此萧败令人厌恶而心理记忆中的故乡是如此美好令人难忘的矛盾。

陶渊明的一生是在“形”（指出仕）和“心”（指归田）的两难抉择中犹疑反复、顾虑重重。他早在年轻时，就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壮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29岁时，出为江州祭酒，这是他第一次为官，不久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sup>[5]（P2461）</sup>。以后在桓玄幕府任职，也总是“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林》）。40岁时，就任刘裕的镇军参军，在赴职途中就写道：“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41岁时，做了80多天的彭泽令，“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此后永择归田，坚不出仕。但正如鲁迅所说，他“于朝政还是留心”，有过“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羡慕功名的明显流露（《读史述九章并序》）；有过对篡权者刘裕用毒酒谋杀晋恭帝暴虐行为辞意隐晦的义愤（《述酒》）；有过“无爱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功名难成的慨叹（《感士不遇赋并序》）。《归》中的两幅画面，表现出诗人归田后轻松、愉悦甚至狂喜的心态，但这是因为《归》是诗人“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初写成的。就是在这篇赋中，诗人也流露出“惆怅而独悲”、“惶惶欲何之”的难言苦涩。

在如“铁屋子”一般黑暗和牢固的中国农业社会及整个中国之内，鲁迅是少有的几个觉醒者和叛逆者之一。虽然他宣称“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但正如T·S·艾略特所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会产生伏尔泰和尼采”，儒家文化主张“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的影子；他毫无媚骨的“硬骨头”精神，正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儒家人格的投射。这种为国为民的深切忧患感和责任感，迫使他拿起解剖刀对准愚昧的国民，也对准自己。“立人”，正是他一生的理想，《故乡》中农村的萧败落后，闰土的麻木不仁，杨二嫂的自私刻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对立，国民性的劣根愚昧，以及觉醒后的知识分子的彷徨无路，都是他要解剖、疗救的对象，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离乡和恋乡的矛盾中煎熬一生。他深切希望故乡的人们醒悟，认识和改变这种愚昧麻木的人生，争得作为“人”的正当的生活和权益。他对故乡的深情就表现在对故乡的憎恶之中，是一种逃离之恋，反抗之恋，批判之恋，正如职业道德高尚的医生对他手术刀下的病人一样的感情。“《故乡》这样的乡土小说，更多的是流露出对闰土式农民自上而下的人道主义同情……完成对农民的‘地之子’哀怜的主题的。”<sup>[6]</sup>这可以成为本文论据另一角度的论据。

陶渊明对故土田园是一种回归之恋、固守之恋。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宋儒学大家陆九渊说“李白、杜甫、陶渊明，皆有志于吾道”<sup>[7]</sup>，抱着“大济于苍生”的用世理想几次出仕，又几次归田。（出世的原因当然也有如《归》中所言的“余家贫，耕织不足以自给”的“生生所资”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儒家用世思想，这在陶的多篇诗、赋中可见。）其一是当时的政治原因。魏晋门阀制度“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陶渊明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处处受到大地主的挤压，他的祖父陶侃官至八州都督，荆州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显赫一时也未能获得如同王、谢等名门大族相同的地位。何况是他“自余为人，逢运之贫”（《自祭文》），“少而穷苦，每以家蔽，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当时战乱不断，司马道子专权，王国宝乱政，

王恭、殷仲堪起兵，桓玄篡位，刘裕代晋称帝，其世道不舛，腐朽如此。“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并序》）所以他最终选择归田。其二是自己的人格理想使然。《归》中说他“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不愿“以心为形役”，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任真自得，委运于自然造化，“惟求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sup>[8]（P142）</sup>。不愿随俗浮沉的陶潜终弃官离去，欲寻求一个随顺自然、抱朴守静的完美世界与现实对抗，以坚守“固穷”的高洁操守。这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对抗方式，虽然他未能真正找到。（这一点下文论述）其三是学者魏正申认为的陶渊明归田有“立德”、“立言”、“以文传世”之理想。中国文学自“建安”之后，就进入了“自觉时代”。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种观点对魏晋文人影响颇大。魏正申还从陶渊明“作品思想内容与时代气息的相通及塑造自我形象以传于世”、“田园诗的写作和艺术表现上的刻意创新”、“重视诗文的传播”<sup>[9]（P199-110）</sup>等几个方面论证其观点。综论之，故土田园是陶渊明政治理想的延伸地、人格理想的完美地、人生理想的追求地。

《故乡》和《归》这种表层场景意义上的“异”和深层意蕴上的“同”，还可以从两文作者情感节奏的变调中看出。《故乡》有一种协奏曲式的结构：以灰暗、沉闷的调子引进主题，回忆童年和闰土的交往时调子变得轻快，杨二嫂的出场给人一种诙谐曲式的跳跃感，中年闰土的调子是平缓、滞塞的慢板，最后回到了矛盾、失落、困惑和挣扎的主题上。《归》也是一章繁复的交响曲：“自免去职”的轻松，“载欣载奔”的欢喜，“将有事于西畴”的劳动的愉快，“以心为形役”的追悔，“惆怅而独悲”、“遑遑欲何之”的壮志难酬的悲伤和困惑。不管作者对文章的结构如何安排，对场景如何选择，他注入文中的情感，总要真实地流露，因为这是文章的意旨所在。《故乡》和《归》情感之音的共鸣，正说明了两文“理想和理想的幻灭”的共同主题。

## 二

然而故乡毕竟是美丽的，尤其当掺杂了理想因素后，更具有精神家园的色彩。请看“美丽的家乡”图：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故乡》中此图亦包含“我”和少年闰土交往时的情景。）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

这两幅画都有“物我的混化”与作者“情趣的流注”<sup>[10]（P297）</sup>。画面清纯真挚，充满自然的淳美和人际的和谐，是理想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

再看“感思图”：

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本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故乡》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

希望的虚幻和人生的达观，心灵的自剖和生命的放纵，对前路的怀疑和对乘化的“复奚疑”。

《故乡》中“美丽的故乡”图，是鲁迅作品中少见的富有古典意境美的童话般的世界。（《呐喊》集中的《社戏》和《野草》中的《好的故事》亦有此种意味的回忆情景。）当他把内心的视镜摇向童年，所成像的一个童年世界与现实的成年世界截然对立。前者中的人聪颖活泼、亲密友善，生命力张扬，与自然和谐，后者中的人愚昧麻木，隔膜对立，生命力萎缩，自然对人挤压。那是一些未经社会理性污染的人，一个充满纯净真趣的世界，这是鲁迅以启蒙主义者不可抑制的生命激情的呼唤，人应该打破一切的束缚、桎梏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是作家在现实中失落，而在小说中找回的世界，是他灵魂的“故乡”。“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坟·我之节烈观》）鲁迅一生，都在寻求和创建这个“故乡”。

鲁迅清楚地明白：这个乌托邦式的世界是永远寻觅不到的，《故乡》中的童年世界被成人世界击得粉碎。《社戏》中纯朴怡静的乡村生活，现实中粗俗嘈杂的城市生活正与之对立。《好的故事》中的“整篇的影子”，在“昏沉的夜”“何尝有一丝碎影”。“鲁迅的《故乡》是描写少年（即希望）从幻想的风景（即我的美丽的故乡、甜蜜的理想之乡）中消失，然后照出严寒的现实的现实的作品。这简直是鲁迅亲自宣布自《狂人日记》以后，不自计划出《新生》以来，所构筑的希望理论、人类主义的破产。”<sup>[11](P155)</sup>大约在写《故乡》的同期，鲁迅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小说中的主人公说“我不信黄金时代”。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的话表明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怀疑：“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归》中理想的故园是“世与我而相违”的栖息之地，人人欢欣，热情来往，耕桑自给，美景宜人，已有《桃花源诗并记》中理想圣地“桃花源”的雏形。王瑶考订《桃花源诗并记》是陶57岁时的作品，也即从很早起，诗人心里就有了“世外桃源”的影子。它更是一种人生理想的境界。陶渊明比西方社会早一千年就描绘了人类社会的乌托邦，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诅咒和否定。在他理想的世界里，没有剥削，没有战乱，人人平等，劳动自给，人人欢乐，安居乐业，自然和谐，人人都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sup>[12](P222)</sup>这种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的美好理想使一代代的读者为之痴迷和叹服，它是陶渊明的政治理想、人格理想和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

陶渊明心想往之的理想圣地，同时给人强烈的虚幻感，乌托邦总是个“非在”。《归》中诗人吟咏美好家园后，又禁不住问自己“胡为乎遑遑欲何之”，道出了他的困惑和对眼前一切的幻灭感。《桃花源诗并记》中写太守遣人去寻，“不复得路”，高尚士刘子骥欣然规往，亦“未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倒不如理解为诗人宣布桃花源的无可觅和自己理想的虚幻。现实正是如此，后期的陶渊明在他固守的田园，备尝辛酸，历尽艰难。

一方面他抱守“宁固穷以济志”的坚定操守，一方面又在诗赋中书写了大量的“穷”：“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并序》）“苦”：“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悲”：“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己酉岁九月九日》）“孤”：“敛辔 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读史述九章并序》）“疑”：“疑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感士不遇赋并序》）“叹”：“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挽歌诗三首》其一）真是百念交集，触目伤感。60岁前后，晋宋易代，变化不已，他痛心疾首，充满愤恨，又无力改变，陷入悲观绝望。《自祭文》中“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诗人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极端愤懑和绝望，故土田园并不是他灵魂的理想寄居地。

### 三

《故乡》中“我”最后坐船离乡的姿态具有象征意味。鲁迅乡土小说中的觉醒者又是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者，这种惶惑感体现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实中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他们永恒的姿态是“走”，“走”是对希望的否定，对绝望的抗争，是超越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著态度”<sup>[1]:(P275)</sup>。“走”这种意蕴在《野草》的《过客》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一个困顿倔强，眼光阴沉的过客永恒地走在似路非路的路上，他忍受着孤独、创伤和痛苦，拒绝了诱惑，决不停息……虽然明知前面是坟。《故乡》中“我”走向虚幻，《在酒楼上》吕纬甫走向“模模糊糊”，《孤独者》魏连殳走向死亡。孤独者的“走”表现了真正的“绝望”主题：觉醒者的幻灭。

陶渊明终生追求的是“化”境，“化”有多种内蕴和多种阐释。《归》中“聊乘化以归尽”是指顺应自然的生死，“乐夫天命”的生死达观态度。“化”也是一种空无、玄妙的人生最后归宿，“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化”还有一种心理净化功能，化去对现实名利的贪恋和追逐，“去去百年后，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亦可以“化”于古人甚至神话之中，以述其志。“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十》）更多的是顺随自己不能“适俗韵”的天性，“化”已于自然之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并序》其五）“化”是陶渊明人生理想的体现。但他性格中猛志之“动”的一面使他对声名之念并不能忘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事诗二首》其二）。他其实未臻“化”境，这是一个永远矛盾的陶渊明。鲁迅的“过客”毫不迟疑走向坟墓，陶渊明对自己人生追求的归宿也带一种达观式的悲观。他在《归》中说“寓形宇内复几时”，自己只是寄予天地之间，其结局是“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托身的天地终须辞去，“本宅”（指坟墓）才是人生的目的地，他终究未能“纵浪大化中”，这与“过客”的“走”之旅何其相似！

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上说：“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的系统。……在对于社会的热情，及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一面，鲁迅是继承了他们的一脉的。”鲁迅和陶渊明都绝望

于当世,又都有着执著的人生理想。在理想和幻灭的绞扭中,这两颗伟大的心灵超越1500多年碰撞在一起。陶渊明所称颂的精卫、刑天和夸父“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悲壮形象,正是以笔抗击黑暗的鲁迅的写照。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铮铮骨气和固穷济志、返归自然的峻洁人格,千百年来影响了多少人。这种操守,是中华民族性格中足以自豪的一面,从此意义上说,他正是鲁迅所礼赞的中国“脊梁”式人物。

#### 参考文献:

- [1]鲁迅.而已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J].文艺报,1956,(19).
- [3]张全之.背对故乡——鲁迅之思乡心理及其小说创作[J].齐鲁学刊,1997,(4).
- [4]周芾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 [5]房玄龄.晋书·隐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丁帆.鲁迅乡土小说的理性批判意识和悲剧意识[J].南京大学学报,1992,(2)
- [7]陆九渊.象山全集:卷三十四[M].
- [8]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9]魏正申.陶渊明评传[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 [10]朱光潜.诗论[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4.
- [11](日)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7.
- [1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13]汪晖.反抗绝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Comparison of Lu Xun's *Hometown* and Tao Yuanming's *The Song of Return with Preface*

FAN Wei-dong<sup>1</sup>, XIA Xin-cai<sup>2</sup>

(1 *Off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Nanjing A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3, China;*

*2 News Center of Suzhou Television,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some scenes from *Hometown* and *The Song of Return with Preface*, it is evident that Lu Xun and Tao Yuanming were idealists of their respective times. However, both were disillusioned, and they struggled in fulfilling their ideals. “Escapement” and “Seclusion” became their lifelong attitude.

**Key words:** Lu Xun; Tao Yuanming

(责任编辑 吴蕴东)